



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五

福建人民出版社

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五)

*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73·232 定价: 0.24元

目 录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评论员 (1)

“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8)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 (17)

张春桥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中共山东省菏泽地委大批判组 (28)

三十年代的张春桥.....国家文物局理论组 (33)

老反革命张春桥的本来面目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批判组 (40)

伪造历史是为了篡党夺权

——戳穿叛徒江青的假面具

.....中共山东省委大批判组 (50)

是“反封建的英雄”还是地主阶级代言人？

.....广州部队理论组 湖北省军区理论组 (56)

叛徒江青与叛徒戏.....黄 霖 晓 东 (60)

剥去假面具 还其真面目

——姚江公社贫下中农揭露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
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69)

姚文元是地地道道的阶级异己分子

——揭露和批判姚家父子的反革命勾结.....施 达 (75)

姚文元是个漏网的大右派.....昆明部队政治部理论组 (83)

反革命文霸——姚文元.....久 联 史 般 (90)

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周 欣 (101)

斥“流氓创业”论.....高 治 (116)

盖不住的丑史 抹不掉的罪证

——揭露“四人帮”相互包庇，销毁反革命历史

材料，杀人灭口的罪恶阴谋.....公安部批判组 (125)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评论员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究竟是什么人？“四人帮”究竟是一伙什么东西？

长期以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利用了所有舆论工具，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吹嘘他们不但是文化大革命“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而且有一部“出身清白”、“一贯革命”的光荣历史。现在，真相大白了。六个多月来，党中央遵循毛主席教导的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审查。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之，他们是一伙反革命，而张春桥和江青还是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四人帮”就是由这样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早在三十年代初，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在济南上中学时，就充当国民党特务，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使六

名革命青年受迫害，其中一名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骨干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秋，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接着又采取隐瞒反革命历史和反革命家庭社会关系，欺骗党组织的手法，钻进了共产党。

地主家庭出身的江青也是在三十年代开始她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她加入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她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不久自首叛变，从狗洞里爬了出来。接着她也结识了崔万秋，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崔万秋曾在反动报刊上对她进行肉麻吹捧。江青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积极参与了“购机祝寿”的活动，为国民党效劳，向蒋介石献媚。一九三七年，她与另一个叛徒订立攻守同盟，混入延安，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这个叛徒出面做了假证明，钻入党内。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九三四年叛党出狱的，以后就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领导下充当文化特务。姚文元小时就深受徐恩曾和他的老婆叛徒费侠的喜爱，当了徐恩曾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干儿子。以后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到徐恩曾夫妇逃到台湾。一九四八年上海解放前夕，姚文元隐瞒

了他父亲的叛徒、特务身份和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隐瞒了自己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混进党内。解放后，姚蓬子坚持反动立场，反共反人民，于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姚文元竭力包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利用窃取的权力，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勾结王洪文、张春桥千方百计包庇姚蓬子，使他得以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审查。长期以来，姚文元一直同姚蓬子保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一九六九年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还继承了姚蓬子除存款外的全部家产。“四人帮”的党羽所大肆鼓吹的所谓“姚文元道路”，就是这么回事。

王洪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参加过军，当过工人，但他在部队和工厂时就表现不好，作风不正。他不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观。在上海时经常和一些四类分子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流氓习气严重。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在上海拉了一帮“小兄弟”，搞特务活动，结帮营私。特别是他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勾结到一起之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疯狂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终于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他利用窃取的职权，大量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产，生活腐朽糜烂。王洪文是一个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是号称“左派”、“激进派”的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

“四人帮”崛起和覆灭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越是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越是要钻到无产阶级内部来，采取“从内里蛀空”的战术。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象掩

盖起来。“四人帮”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在“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来说，革命的口号不过是他们搞反革命的一种策略，一种伪装。几个月来对他们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已经把他们的“左派”假面具撕得粉碎，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狰狞嘴脸。现在，揭开他们的老底，弄清他们的过去，对于他们为什么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对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那样刻骨仇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不择手段地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全面内战，等等，这一切难以常情加以解释的问题，就更加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营垒中的人物，是以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为任务的。什么“左派”、“激进派”！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是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大造舆论，欺世盗名，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主要成员陈伯达等人，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搅乱阶级阵线，混淆两类矛盾，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便他们浑水摸鱼，乱中夺权。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

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是窃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扒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人帮”自称“站在先进分子一边”，“依靠造反派”。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和“造反派”是些什么人？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他们把这些人封为“反潮流”的“先进分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对于这些人，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没有当官的，突击提干。他们绝不是那种一般地拉山头，搞宗派，而是建立了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有他们的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宣传部长，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基地，有特务联络据点。他们的黑手插进了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机关，他们还搞“第二武装”。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尽管他们在八亿人民中只是极其孤立的一小撮，但能量很大，不可低估，其流毒之广，为祸之烈，影响之深，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恶历史的揭发材料，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

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他们秘密转移、大量销毁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他们还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查抄知情人的家，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逮捕知情人，长期关押，残酷迫害，直到杀人灭口。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大量的人证物证还是找出来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四人帮”那些毁灭罪证的伎俩，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无比正确，

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的意义重大深远，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尽管王张江姚“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是我们要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要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全部揭发，把“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彻底批臭，把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查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查清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和事，绝不能手软，坚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通过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促进生产，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和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广大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组织起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纲治国，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了，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人们拿到这本渴望已久的宝书时，欣喜之余，曾激起对疯狂破坏这本宝书出版的“四人帮”的仇恨。张春桥有一次恶狠狠地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对右派有利。”出版毛主席的书竟然使得“四人帮”这样仇恨，岂不奇怪！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在“四人帮”的词典里，“右派”和“左派”的涵义是颠倒的：他们说的“右派”，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他们说的“左派”，即象他们那样的反革命黑帮。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不是有许多有关识别反革命黑帮的教导吗？别的且不说，仅此一点，就对“四人帮”大大不利了。当年毛主席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今天仍然象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着“四人帮”的心脏。因为他们都是反革命黑帮，必有“同”在；因为它们所处的时期、条件和地位不同，又有“异”存。拿起这把刀子，解剖这两个反革命黑帮，辨其同异，明其渊源，这对于深入地揭发批判“四人帮”，是很有益处的。

帮，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查一查辞书，原意是

“同类的人为自私目的而互相勾结”。我们只要把“自私目的”改为“反革命目的”，就足以概括这两个黑帮共同的本质特征了。

他们是什么样的“同类”呢？先说胡风集团，其头子原名张光人，曾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阿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又一个骨干分子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四人帮”又怎样呢？他们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样，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稍有不同的是，还多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

这一类人勾结在一起为了什么目的呢？胡风集团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几乎恨一切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四人帮”对无产阶级专政、对革命人民的切齿痛恨，比起胡风集团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狂吠要“改朝换代”，要“杀人”，要“枪毙一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如果竟然一时得逞，那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让蒋介石国民党王朝卷土重来。他们作为蒋介石国民党的代

表，是比胡风集团更为典型的。

他们结帮的目的既然如此“远大”，人少了是不行的。因而总得不断扩大自己的“圈子”。胡风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他们努力“争取人，联络人”，“埋头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想方设法“开辟岗位”，拉人下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四人帮”招募“帮手”，不择手段，与胡风同，而其手法则比胡风高明得多。他们明明是拉人入帮，却说是“选拔新生力量”。明明是要搜罗一批反革命小丑，却美其名曰“培养反潮流战士”。明明是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安插亲信，建立“帮天下”，却自诩为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要“以中青为主”。他们袭用林彪“诱以官、禄、德”的一套，把那些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叛国投敌分子、“打、砸、抢”的首恶分子、“阿飞司令”等社会渣滓统统网罗进来，充当轰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排炮。无怪乎江青洋洋自得地吹嘘说：“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

有了一伙“帮手”，如果他们都被屏于无产阶级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之外，不能里应外合，那是难以将堡垒攻破的。有个“四人帮”的喽罗说得好：“当官不入党，有权也难掌。”所以，无论是胡风集团还是“四人帮”，都十分重视他们一伙如何打入共产党内窃取党员称号这件事。胡风集团提出了“深入到他们的肝脏里面去”的反革命策略。他们兼用钻进去、拉出来的两手，一方面指使其骨干用尽心计欺骗组织，以便混进党内；另一方面对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共产党员做“工作”，尽力把这些人拉进帮内。他们的努

力果然收到“成效”，一大批胡风分子钻进党内来。不过，比起“四人帮”来，却又小巫见大巫了。王张江姚不仅深入到我们党的肝脏，而且可以说已经钻进我们党的神经中枢，窃取了中央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因而可以凭借手中的党权胡作非为，把他们的亲信、爪牙、“小兄弟”，用点名入党、突击入党、“飞过海”入党等办法，一批批硬拉进党内，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帮派体系，使他们这个“帮”成为党中之党，自成系统，妄图取党而代之。

结帮反党，结帮篡党，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明火执仗地干是不行了，他们只能耍两面派手法，“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那些结帮反党的“英雄”们，必然要玩弄种种阴谋，攻击和破坏这个理论基础。

“过时了”，胡风集团这样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阴沉沉地说：“这书（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四人帮”和胡风分子唱的一个腔调。江青声嘶力竭地叫嚷：《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现在不适用了”！张春桥则躲在阴暗角落里冷言冷语：“我最近在重读《毛选》四卷，越读越感到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不甚了了。”为什么？“过时了”，不适合“今天各阶级的情况”了。于是乎，这个老反革命，就来动手填补今天的“空白”。他兴师动众，大搞所谓阶级关系的调查，妄图编造出一个“阶级关系变动论”，树起所

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

其实，“过时论”只是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较为阴险狡猾的一手，他们在私下里，在同伙之间，却用畜牲般的语言进行恶毒的攻击。胡风集团污蔑马列主义为“市侩的唯物主义”，叫嚣要“给市侩底唯物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们咒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是“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胡说“它能屠杀生灵”，造成“乱七八糟的皂隶式的机械主义，耀武扬威，把现实主义底生机闷死了”。“四人帮”一伙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较之胡风犹有过之。江青把毛主席对她的告诫污蔑为“紧箍咒”，咬牙切齿地说：“他一念紧箍咒，我就头痛。”张春桥竟然宣称：“马恩的有些话也有问题，让人家看，看了要使他们学会分析。”分析什么？就是分析所谓马恩“也有问题”。

“四人帮”的亲信更是凶相毕露，狂喊乱叫：“马克思如活到现在，也可以批判。”“要抓辫子还不容易？恩格斯我也可以贴他一百张大字报！——这是关起门来讲的。”妙极了，“关起门来讲”，活画出这个反革命黑帮见不得人的狼子野心！

他们心底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此的深恶痛绝，可是，在表面上，在公开的场合，却偏偏要把自己装扮成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胡风一语道破了天机：“是为了把大旗抓到手里”。所以，在他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中，就引用了许多马列和毛主席的词句；有些“列宁底话”，“记不得直接出处”了，还专门叫同伙给他“查一查”。

他生怕同伙不领会他的这种“抓大旗”的策略，还不厌其烦地一再嘱咐他们：“为了‘字面’上要站稳‘立场’”，“要再看些马列主义”。“四人帮”同胡风一鼻孔出气。张春桥曾经不打自招地说：“写文章要讲道理，讲道理就要引用马列主义，要引证就要去找，就得学习。”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原来张春桥之流读马列的书，就是为了寻章摘句，装点门面，以便抓大旗作虎皮，去判定那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是搞“经验主义”、“折衷主义”等等。这与胡风“把大旗抓到手里”，去对革命文艺工作者任意作出“庸俗社会学”、“机械论”等等的判决，何其相似乃尔！

虽然，这两个黑帮仇恨马列主义之心同，“抓大旗”之术同，但其为害革命的程度却是大相径庭的。原因是：胡风集团所据舆论阵地终究有限，“四人帮”却一度舆论大权在握。据此，“四人帮”可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可以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到伪造毛主席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甚至妄图垄断毛主席著作的发表权和解释权。毛主席刚去世，张春桥就对他的亲信说：“《毛选》五卷不能出了，只能出单篇。”为什么不出选集只出单篇呢？这个亲信作了很好的注脚：“这可厉害了，要怎么出就怎么出，要整谁就整谁！”原来，他们是想把毛主席著作垄断起来，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什么时候发表，一切服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张春桥认为发表出来对他们不利，就恶狠狠地说，这本著作“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要砍掉”。毛主席著作居然“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等于说太阳不发